

契爾年科上臺與蘇聯內外動向

畢英賢

蘇聯共產黨前任總書記安德洛波夫於今（一九八四）年二月九日去世，經蘇共中央非常全會決議，由契爾年科接任。按照蘇聯現行憲法規定，蘇聯共產黨是蘇維埃社會的領導與指導力量，是其政治與一切國家及社會組織的核心^①；因此，蘇共的領袖就是蘇聯政治體系的權力中心。蘇聯是兩個超級大國之一，其國內的政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國際局勢。蘇聯是一個極權國家，政治領袖對政府政策有較大的主宰權。因此，在蘇聯問題上，了解其政治首腦同了解其政策一樣重要。

如今，蘇共在短短的十五個月之內兩易其主，使西方的蘇聯問題專家頗有應接不暇之感。雖然如此，從短程與中程觀點，窺測蘇聯政策方向並非不可能之事，其原因至少有二：第一，蘇共政策有一定程度的延續性。第二，新任領袖很難有足夠的影響力或權力作政策上的劇變，尤其目前蘇共上層領導集團老化、保守，大部政治局成員們皆不願在政策上作出急遽的改革。

本文擬對安德洛波夫短命統治作一歷史性的總結，析述新任總書記的背景，以及在他領導下的蘇聯權力結構與政策方向。

註①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一九七七年）第六條，〔蘇聯〕（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一九八三年），第五二二頁；《真理報》V，

一九七九年十月八日。

對安德洛波夫的論定

蘇共中央及蘇聯政府在公佈安德洛波夫死亡的告民衆書中說：「安德洛波夫領導蘇共中央委員會爲期短暫。但是，在這段時間內，黨遵循二十六大所訂方針並予以創造性發揚，確保了經濟與社會進步的各方面的穩健進展」^②。這一段話至少有三點含義：(一)在安德洛波夫領導期間，大體上是集體領導；(二)政策方針具有很高程度的延續性；(三)他的領導對蘇聯有一定的貢獻。這應當是蘇共中央及蘇聯政府給他的總評，當然並不反映民衆意見。

安德洛波夫上臺之初，有些西方觀察家認爲他是新史達林主義者，另一些人視他爲西方式的自由主義者。事實證明，這兩個極端的判斷都不正確。至今，他的政治哲學仍然是撲朔迷離。實際上，他是一個典型的蘇共黨官僚，也是一個新型的政治家，其作風與以往的蘇共領袖皆有明顯的差異。安德洛波夫非常善於言詞，能夠作出長篇闊論；既精於逢迎，又精於以言詞攻擊對手。他能夠預測對手的行動，也會巧妙地安排陰謀羅網。同大多數蘇聯人一樣，他具備順應主義與雙重思想的特質；其心理型態的特點是唯物主義狹窄心胸與宿命論觀點。安德洛波夫的行爲指針是集體主義，避免突出羣衆置身共同潮流之外；竭力贏取羣衆的愛戴，必要時却能表現堅定不移與冷酷無情。他知道如何使人民畏懼他，而無須令他們恐怖與憎恨^③。

安德洛波夫死後，蘇共官方發表了他的生平^④。他於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五日生於鐵路職員家庭，十六歲開始自謀生活，作過勞工，當過海員；當他加入蘇聯共青團之後，就不斷上升，一九三九年已成爲雅羅斯拉夫省(Yaroslavskaya Oblasti)共青委會第一書記；兩年後升任卡累利亞(Karelia)^⑤蘇聯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德蘇戰爭期間，他參加游擊活動；戰後，幾經調遣，於一九四七年任卡累利亞共黨第二書記；一九五一年調蘇共中央任職；一九五四年任駐匈牙利大使；一九五七年調回蘇共中央任「對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關係部」部長；幾年後升任中央書記；一九六七年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一九八二年調返中央重任中央書記；年底，布里茲涅夫去世，安德洛波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成爲蘇共政治體系中的頭號人物。

註② 「蘇共中央、蘇聯最高蘇維埃、部長會議告共產黨與蘇聯人民書」，《真理報》，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一日，第一頁。

註③ 冉佐夫(I. Zemtsov)，《安德洛波夫：政策困境與權力鬥爭》(*Andropov: Policy Dilemma and Power Struggle*) (Jerusalem: IRICS, 1983)

，第十五—十九頁。

註④ 「尤里·弗拉吉米羅維契·安德洛波夫」，《真理報》，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一日，第二頁。

註⑤ 卡累利亞是俄羅斯境內一個自治共和國(Karelskaya ASSR)；一九四〇年曾升格爲卡累利——芬蘭共和國，一九五六六年恢復自治共和國地位。

安德洛波夫接掌蘇共總書記時，從布里茲涅夫手中繼承了一系列問題，其中尤以經濟問題特別明顯。經濟問題繼續惡化勢必影響政治的安定性。因此，他上臺之後，把較多的精力放在國內問題上，而對國際問題則未能大力以赴。在安德洛波夫總書記任內，蘇共中央開過三次全會，每次他都發表了政策報告^⑥，他的政策主張與改革見解大致包含在這些文件中。他死後，蘇共中央認為，在安德洛波夫的這些報告中「當前黨的戰略，也就是完善已發達社會主義的戰略，得以發展與具體化」^⑦。

安德洛波夫執政後，集中精神以加速蘇聯經濟發展，改善國民經濟管理，強化黨、國家與勞動紀律，提高幹部責任。在黨務工作上，他強調完善意識形態工作，建立高度道德感，全面改善勞動人民的共產主義教育。作為蘇聯國防會議主席，安德洛波夫注重蘇聯武裝力量的發展，使蘇聯國防威力保持應有的水平^⑧。

長時期以來，蘇聯對外政策皆以「和平綱領」為基礎^⑨。安德洛波夫領導蘇共並未作明顯修改，因此，他所發表的關於國際問題的談話，與布里茲涅夫時代並無兩樣。但是，與往昔不同，他大多以個人回答報刊記者問題的方式，分析當前的國際情勢與蘇聯的因應措施^⑩。這表示他在對外政策上有充分自主權，也象徵著他在蘇共內的權力相當穩固，是一個任意發言的領袖^⑪。在國際重大問題上，尤其是美蘇問題，他的態度是強硬的、不妥協的。

在安德洛波夫統治期間，蘇聯最明顯的國內成就是經濟情況有了一些改善，扭轉了多年來生產增長速度不斷下降的趨勢；整飭了政府與勞動紀律。因此，契爾年科在安德洛波夫的葬禮上說：「蘇共中央委員會集體作成的決定在黨與人民間收到充分的執行，已產生了不少積極的改變。這方面，極大的功績歸於安德洛波夫」^⑫。這可謂是在安德洛波夫蓋棺時，對他十五個月領導所作的定論。在對外政策方面，契爾年科祇講到安德洛波夫致力於「維護和平，使人類免於核災難的威脅」，並未明顯地提出任何成就。事實上，在他當政的一年多之中，蘇聯外交頻遭失敗，尤其美蘇關係的惡化，達到近二十多年來的頂點。

註^⑥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全會；一九八三年六月及十二月全會。

註^⑦ [真理報]，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第一頁。

註^⑧ [真理報]，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第二頁。

註^⑨ 所謂「和平綱領」，係蘇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外交政策文件，見[真理報]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註^⑩：例如：「安德洛波夫答[明鏡]（*Der Spiegel*）問題」，[真理報]，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答[真理報]問題」，[真理報]，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及十月二十七日，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安德洛波夫關於美蘇關係的聲明」，[真理報]，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註^⑪ 赫夫（Jerry F. Hough），「安德洛波夫的第一年」〔共產主義問題〕（*Problems of Communism*），一九八三年十一及十二月號，第六〇頁。

註^⑫ 「契爾年科在安德洛波夫葬禮上的講詞」，[真理報]，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第一頁。

安德洛波夫當政後，健康不佳，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他的不良健康並沒有影響他鞏固權力的過程。相反的，他健康的衰弱變成政治資本；他的對手們覺得沒有需要聯合對付他，而為即將來臨的繼承問題作準備^⑬。果然，他在病臥將近半年之後，死於任上。

二月十三日，蘇共舉行非常全會，「一致」推舉契爾年科為新任總書記。

關於契爾年科的生平與昇起

康斯坦欽·烏斯欽諾維契·契爾年科（Konstantin Ustinovich Chernenko），俄羅斯人，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於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Krasnoyarsky Kray）的農民家庭。一九三一年入黨，高等教育程度，畢業於教育學院及蘇共中央黨組織工作者高等學校。契爾年科很早就開始勞動生活，最初當地主的長工。他以後的勞動活動與在共青團和黨機關中的領導活動聯繫在一起。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領導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共青團諾伏賽羅夫斯克（Novoselovsky）區委會宣傳鼓動組。一九三〇年，他志願參加紅軍；一九三三年之前，在邊防軍服務，任邊防卡哨黨組織書記^⑭。

契爾年科從部隊復員後，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工作，先後任：諾伏賽羅夫斯克區及烏雅爾斯克（Uyarsky）區黨委會宣傳鼓動組組長、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黨「教育之家」主任、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黨委會宣傳鼓動部副部長、書記。一九四三年，進入蘇共黨組織工作者高級學校就讀；一九四五年畢業後，任平札（Penzensky）省黨委會書記。一九四八年，調至莫爾達維亞加盟共和國，被任命為莫爾達維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鼓動部部長。在這個工作崗位上，他參與該加盟共和國的經濟與文化建設，及勞工人民的共產黨教育工作。

一九五六年，契爾年科被調到蘇共中央委員會工作，擔任宣傳鼓動部羣衆鼓動處處長，兼任「鼓動者」（Agitator）雜誌編輯委員會委員。一九六〇年起，任蘇聯最高蘇維埃書記處主任。一九六五年，契爾年科奉派為蘇共中央委員會總務部部長。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一年，他任蘇共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一九七一年，蘇共「二十四大時」，被選為中央委員；一九七六年三月全會時，被選為蘇共中央書記。

一九七七年，契爾年科成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七八年起為正式委員；他是蘇聯第七至第十屆最高蘇維埃代表；俄羅

註^⑬ 赫夫，「安德洛波夫的第一年」，第六十頁。

註^⑭ 關於契爾年科的生平資料，係取自蘇聯公佈資料，見《真理報》，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四日。

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第十屆最高蘇維埃代表。契爾年科一九七五年會是出席赫爾辛基「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代表團團員；一九七九年參加維也納裁軍問題談判。

從契爾年科的經歷看，他既沒有在政府內擔任過要職，沒有軍事上成就的紀錄，也沒有處理外交事務的經驗，更沒有工業管理或地方行政經驗。但是，他却具有高度的組織能力與意識形態方面的修養。他曾就提高黨在蘇聯社會生活、完善黨政工作作風與方法、發表社會主義民主等問題撰寫論文，並有文集出版^⑯。一九八三年六月，契爾年科在蘇共中央全會上以「黨意識形態與羣衆政治工作的迫切問題」為題發表演說，確定了改善現階段蘇共意識形態的主要方向^⑰。

在七十年代中期，當布里茲涅夫病老力衰之際，原屬意基里林科（A. P. Kirilenko）為其繼任人，後來兩人因政策上意見相左，布里茲涅夫於是另找一個繼承人，而這個被提升的人不致立即威脅他自己的地位^⑱。於是，他在政治局以外選中了契爾年科。後者於一九七六年調升中央書記，次年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七八年升任正式委員。這種三級跳式的上升，在蘇共歷史是罕見之事。五十年代初，契爾年科與布里茲涅夫在莫爾達維亞共事。從此，契爾年科成為布里茲涅夫的忠心耿耿的同事、助手和知己。

布里茲涅夫取代赫魯雪夫後，給契爾年科安排在蘇共中央很重要的一個位置上，那就是總務部長。不久，他成為布里茲涅夫在政治局的助手，準備政治局每週的文件，安排議事日程，管理情報和日常事務。當時，他的地位很低，祇是政治局辦公室的服務員，因此政治局的委員們對他並不感到威脅；顯然，他不可能渴望建立在政治局內佔一席之地，經布里茲涅夫鼎力提拔，他乃脫穎而出。從此，布里茲涅夫煞費苦心地培植他，經常使契爾年科與自己一起露面，在電視和報紙上的特寫鏡頭中並起並坐。於是，他在政治局內的排位也逐漸上升。

在布里茲涅夫統治的最後一年內，繼承人之爭已在暗中進行，在蘇聯充滿了怪誕謠言、陰謀犯罪、隱私揭發及神秘死亡^⑲。當時爭取繼承權力者至少有三人：基里林科，安德洛波夫及契爾年科。當時，西方很多觀察家認為，契爾年科繼布里茲涅夫任蘇共總書記的可能性最大。

註^⑯ 契爾年科（K. U. Chernenko），《黨與政府機構的工作問題》（*Voprosy raboty partiinogo i gosodarstvennogo appara*）（Moskva: Izdatel-

ystvo politicheskoy literatury, 1980）；《講話與論文集》（*Sbornik rechey i Statey*）（Moskva: Izdatelystvo politicheskoy literatury, 1984）。

註^⑰ 契爾年科，「黨意識形態與羣衆政治工作的迫切問題」，《真理報》，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五日，第一至三頁。

註^⑱ 賽姆士（D. K. Simes），「康斯坦欽·契爾年科」，《基督教箴言報》，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六日，第十四頁。

註^⑲ 冉佐夫，「安德洛波夫·政策困境與權力鬥爭」，第八十一頁。

結果，布里茲涅夫死後，由安德洛波夫繼承大統，使一些人感到意外。一般認為，契爾年科從此難以復起。安德洛波夫死後，契爾年科竟然登上蘇共總書記的寶座，使更多的人感到意外。

蘇共新領導的可能特徵

契爾年科的重整旗鼓敗部復活，雖然使很多研究克里姆林宮的專家困惑，但是至少證明了兩個假定：（一）克里姆林宮政治情況變幻莫測，難以預見；（二）在蘇聯最高權力轉移之前，呼聲最高被認為最可能的繼承人，往往遭到失敗。關於後者，史例頗多，如列寧死前的托洛茨基，史達林死前的馬林可夫，布里茲涅夫死前的契爾年科，現在又加上安德洛波夫死前的羅曼諾夫。其原因之一是，一旦某人成為繼承權鬥爭中的突出人物，其政敵們則聯而攻之，形成孤立，自然容易遭到失敗。關於前者，乃由於蘇聯政治體系中，缺乏長期被公認的、擁有固定權力的決策中心與可行的權力轉移制度。在這種情況下，每逢最高權力轉移前後，必然產生或明或暗、或強烈或溫和、或長期或短暫的權力鬥爭。加之，蘇共對內部爭權之事，嚴厲保密，西方蘇聯問題專家所知內情極其有限，因之所作判斷往往不甚正確。

這次契爾年科東山再起，有兩種解釋比較合理。第一，蘇聯高級黨政官員對安德洛波夫所推行的改革、整飭紀律等措施不滿^⑯。安德洛波夫加強幹部的責任制與撤換有虧職守的高幹，尤令他們不安。因此，他們挑選了契爾年科。由於契爾年科在與安德洛波夫的權力鬥爭中影響力已被大大削弱，希望把他作為一個有名無實的領袖，也希望他恢復布里茲涅夫的穩健作風。第二，契爾年科是蘇共政治局老年成員與較年輕成員之間妥協的結果。安德洛波夫病危之時，十二個政治局委員似乎已分成兩派，一派是七十歲左右者，一派是較年輕者。年老者固然無意讓較年輕的羅曼諾夫或戈爾巴喬夫作為他們的領袖，而較年輕者之間又相互爭持不下^⑰。在這種情形下，已失勢的契爾年科幸運地坐收漁人之利。

在前述的背景下，契爾年科任總書記期間，蘇共中央集體領導的加強將是其主要特徵。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一方面批評史達林個人崇拜，一方面強調「嚴格遵守黨生活的列寧主義準則與集體領導原則」^⑱。赫魯雪夫掌權之初，尙能遵守集體領導原則；但是在他擊敗馬林可夫自兼部長會議主席後，他便大權獨攬，踐踏集體領導原則。這也成為他被推翻的主要原因

註⑯ 吳德（M. Wood），「布里茲涅夫的人是老看守人的選擇」，《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四日。

註⑰ 司邁爾（A. Smale），「契爾年科的上昇仍是一個神話」，英文《中國日報》，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九日。

註⑱ 〔蘇聯共產黨史〕（莫斯科，一九六九年），第五七六頁。

之一。一九六四年，赫魯雪夫被鬪下臺，蘇共爲保障以後的集體領導，而在一次中央全會上決議，黨的總書記與部長會議主席不宜由一人兼任^㉑。布里茲涅夫接任總書記後，逐步鞏固權力，最後身兼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及蘇聯國防會議主席，集體領導的範圍受到限制。此時，集體領導原則的效力雖已弱化，畢竟還未被完全破壞，政治局內依然保存相當大的集體決策權。一九八二年底，安德洛波夫上臺後，集體領導擴大。基於這個事實，契爾年科在安德洛波夫的葬禮上這樣說：「尤里·弗·安德洛波夫對蘇聯共產黨集體領導核心——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活動作出很大貢獻」^㉒。從任何角度看，契爾年科在政治局內的權力既不會趕上布里茲涅夫，甚至不能與安德洛波夫相提並論。

在最近期間內，蘇共政治局內不會有重大變化。第一，蘇共政治局在一九六六年以後，除了一九七一與一九七三年有較明顯的變動外，從未發生大改組。死於任上或因病辭職者較被鬪下臺者多。作爲一個過渡性領袖的契爾年科很難打破這一傳統。第二，契爾年科是兩派矛盾中的產物，靠布里茲涅夫的餘蔭上升，個人的權力基礎有限，他沒有能力大批更換領導上層的成員。

由於契爾年科曾是布里茲涅夫多年的助手，也是他若干政策的起草人；因此，布里茲涅夫的若干觀點、作風與政策傾向可能在契爾年科身上或隱或現。

契爾年科的政見

鑑於蘇共權力核心仍將維持一個寡頭政治式的集體領導，總書記一人的更換不易帶來重大的政策變更。不過，在無意外的、正常的演進過程中，新任總書記的權力將隨著時間的推延而增長；權力的增長，則對政策的影響增大。問題在於鞏固權力過程的速度。基於他過去關於黨組織與政治思想宣傳與教育的工作經驗，契爾年科在這兩方面將有突出的表現。預測蘇共新總書記將採取強硬路線或溫和路線，成爲保守派或折衷派，都是徒勞無益之事。以西方標準看，蘇聯每一個高層領導人物都是強硬派。目前，欲從契爾年科過去的言論中檢視他的政策傾向，誠非易事，因爲他過去的著作雖多，但直接論及具體政策者却不多見。不過，從他當選總書記所發表的講詞中或可見到一個粗略的輪廓。

契爾年科在講詞中保證，將繼續安德洛波夫一貫堅持實行的黨的原則性路線，並確保政策上的延續性。不過，他解釋說：

註㉑ 《蘇聯共產黨史》，第六二八頁。

註㉒ 《真理報》，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第一頁。

延續性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生動的、實際的事務。其本質主要在於不停留，而要繼續前進」^④。

在黨政方面，他提出完善政府機構的工作、改良黨領導的作風等問題，特別是，黨各級委員會的功能應與行政及經濟機關的任務分清界線，消除它們工作中的重複部分。他批評說，目前各級蘇維埃、部會及企業單位的工作人員未能表現應有的獨立性，把自己應該解決的問題轉嫁到黨組織。兼代經濟領導者這一實際現象令幹部們掃興，使各級黨委會有變成政治領導組織的危險。顯而易見，使黨政職責分明——黨負責領導，政從事管理——將是契爾年科全力以赴的目標，這也是他的專才之一。

蘇共新總書記照例聲明，蘇共的最高目標是改善蘇聯人的勞動與生活條件；他一方面強調以物質與精神方式鼓勵創新與革新，另一方面重申依個人勞動貢獻而進行社會分配。這種他也提到加強秩序與紀律問題。他說，不守紀律、不負責任對社會而言不僅成爲物質浪費，而且引起嚴重的社會與道德損失。在安德洛波夫統治期間內，爲了提高勞動紀律、生產紀律、計劃紀律及行政紀律，以及強化社會法紀，曾採取了很多措施。契爾年科宣稱，這方面已有若干成就，但是尚未完全執行。他說：「這方面，絕不容許放鬆。」可以預見，契爾年科對高層幹部也許不似安德洛波夫那麼嚴厲要求，但是對廣大社會階層的整飭風紀的措施將會繼續執行。

至於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一如既往，乃是要「集約化、使科技成就迅速應用於生產、實行大規模綜合計劃」，以便把蘇聯社會的生產力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上。契爾年科認爲，蘇聯的經濟管理制度與整個經濟機構需要切實地改造。在這方面的工作剛剛開始，其中包括大規模的經濟試驗，那就是，擴大企業單位的權利、加強其責任。同時，蘇聯正在尋求服務部門內新的管理方式與方法。上述以及其他提及的經濟改革措施大部分是剛剛起步、成敗未卜、得失未明，契爾年科登臺之初，沒有理由，也沒有能力予以更張。

契爾年科在接受總書記職務的演說中，也強調了意識形態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係：欲提高經濟水平必須先創造社會的與意識形態的先決條件，同樣的，要解決社會主義意識發展問題，也必須依賴經濟與社會政策的堅固基礎。在這一方面，他特地提示了他於一九八三年六月蘇共中央全會時他自己所提出的關於意識形態與羣衆政治工作的報告^⑤。毫無疑問，這個報告勢將成爲蘇聯爾後的政治與思想政策的基礎。

對外關係方針

註^④ 「契爾年科的講詞」，《真理報》，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四日，第一頁。
註^⑤ 《真理報》，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五日，第一一三頁。

蘇聯新領袖說，在安德洛波夫的領導下，蘇共中央政治局和蘇聯政權最高機關制訂了積極的對外政策。他堅決地聲明：「在這個政策上，我們一步也不退讓。」事實上，蘇聯對外政策也有相當大的繼承性，祇是在不同時期，因不同領袖，其執行方法與作風各有不同而已。契爾年科本人缺乏任何外交經驗，因此將更加仰賴現任外交部長葛羅米科，這一點與安德洛波夫大不相同。安德洛波夫曾任外交官、並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十七年，對國際形勢的了解不在葛羅米科之下。在契爾年科的領導下，葛羅米科也許有較大的活動自由；蘇聯的對外行為也許將較有彈性。

蘇共新領袖上臺後，在對外關係中，最不易發生變化的是對第三世界關係與東歐集團關係；而面臨最大挑戰的是對西方，尤其是對美國的關係；其次，是中共與蘇聯關係正常化問題。

在一九八三年，美蘇關係不斷惡化。雙方在日內瓦舉行的歐洲中程飛彈談判中毫無成就，終告中斷；接著，限制戰略核武器談判與維也納歐洲相對裁軍也告擱淺。蘇聯爲了對抗美國開始在西歐部署中程飛彈，採取了四項措施，特別是準備在東德及捷克部署蘇製中程飛彈。至此，美蘇關係的惡化程度幾乎與五十年代國際冷戰時期相差無幾。安德洛波夫發表聲明說，如果要恢復歐洲中程飛彈談判，美國與北約組織其他國家必須表示準備回復到開始在西歐部署「潘興二號」與巡弋飛彈以前的情況^②。此時，雙方幾乎已形成僵局，難以轉圜。

爲了緩和雙方緊張關係，美國雷根總統首先於今年元月十六日的演講中，表示改善雙方關係的意願；元月二十五日的國情諮文中，他再度表示同樣態度。但是，蘇聯官方對此，作出了否定的反應。安德洛波夫死後，或將給予美蘇關係一個改善的機會。安德洛波夫葬禮前後，西方主要國家相繼表示願與蘇聯和解。美國副總統布希赴莫斯科參加喪禮；二月十四日，契爾年科接待布希，雙方晤談約三十分鐘。契爾年科對美國副總統說，蘇美關係應該建立在平等與對等安全、相互顧慮對方的合法利益，以及彼此不干涉內政的基礎上。他說：「如果美國方面準備顯示實際願望遵守這些原則，這就有可能開始調整兩國之間的關係」^③。二月二十一日，蘇共「真理報」在社論中引用了契爾年科的談話，並表示蘇聯準備與美國關係正常化。從各方面看，美蘇之間的緊張關係可望在近期內開始轉趨緩和。

安德洛波夫死後，中共「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在致蘇聯的唁電中說，安德洛波夫活著的時候不止一次表示欲改善中（共）

註^② 「安德洛波夫的聲明」，《真理報》，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一頁；「蘇聯最高蘇維埃決議：關於國際形勢與蘇聯政府對外政策」，《真理報》，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頁。

註^③ 「契爾年科與布希晤談」，《真理報》，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第三頁。

蘇關係。中共誠心誠意地願意見到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實現。在過去兩三年中，中（共）蘇關係已獲改善[◎]。隨後，中共派「第一副總理」萬里前往莫斯科弔喪，這是二十年來中共赴蘇的最高級官員。可以看得出來，中共似乎在乘此機會加速彼此間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但是，契爾年科並沒有像接待布希那樣會見萬里，祇以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亞里耶夫（G. A. Aliyev）與其會晤。這暗示，蘇聯目前以改善美蘇關係為第一要務；但並沒有忽視中（共）蘇關係正常化。三月，雙方第四回合的磋商將在莫斯科舉行；五月，蘇聯部長會議另一名第一副主席亞爾希波夫（I. V. Arkhipov）將訪問中國大陸；稍後，中共另一名「副總理」亦將回訪。易言之，中共與蘇聯之間的關係將從副部長層次提升至副總理層次。契爾年科的上臺如果不能加速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過程，至少不會減緩其速度。

結論

就契爾年科的年齡及其所處的政治環境而言，他乃是蘇共政權歷史中另一過渡性領袖，沒有足夠的時間逐步鞏固個人的權力，所以在政治局內祇能維持一個不得已的集體領導。

在目前的情況下，蘇聯國內各項改革措施剛剛由安德洛波夫手中開始，或準備開始，契爾年科祇有肅規曹隨，一時難以大動手腳。不過，在對外關係上，確可一挽安德洛波夫時期的頹勢，求得一些表現。

註◎ 〔消息報〕，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三日，第五頁。

中共文字改革之演變與結局

汪學文 著

中共對於「文字改革」，謀略多端，內容複雜，其主要目的在廢棄漢字、篡改歷史，進而破除中華傳統文化。本書詳述中國文字之結構與演進，並對中共「文字改革」工作，從理論與實際，分別加以論析。全書約廿餘萬字，二十五開本，計三百頁，每冊實售新臺幣二百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歡迎惠購。